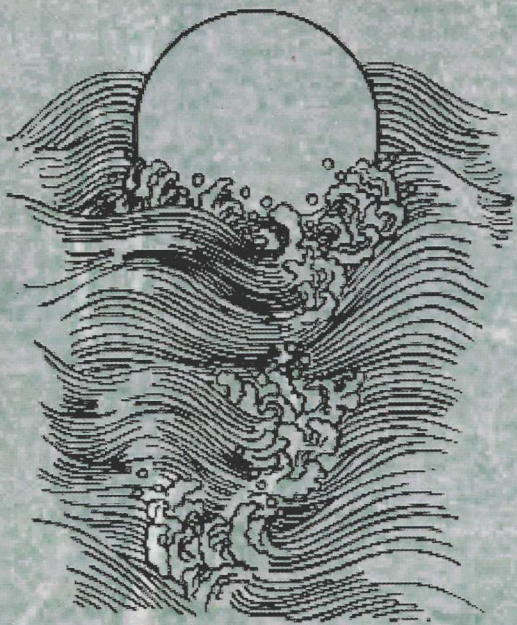


许 霆【著】

中国现代诗学史论



◆ 苏州大学出版社

虞山学术丛书

# 中国现代诗学史论

许 霆【著】



淮阴师院图书馆 584910

◆ 苏州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诗学史论/许霆著. —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9

(虞山学术丛书/丁晓原主编)

ISBN 7-81090-152-4

I. 中… II. 许… III. 诗歌史-研究-中国-现代 IV. I207.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67910 号

## 中国现代诗学史论

许霆 著

责任编辑 王英志

---

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苏州市干将东路200号 邮编:215021)

常熟高专印刷厂印装

(地址:常熟市元和路98号 邮编:215500)

---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47.75(共八册) 字数 957 千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1090-152-4/C·5 定价:128.00 元

(共八册)

---

苏州大学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本社负责调换  
苏州大学出版社营销部 电话:0512-67258802



## 《虞山文库》总序

许 霆

虞山,以“十里青山半入城”的姿态与文化历史名城常熟融合,对常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影响巨大,并进而成为常熟的别名和常熟文化的标志。商末,周太王长子泰伯、次子仲雍让国避奔江南,建立“勾吴”,泰伯、仲雍相继成为首领。仲雍死后葬于常熟卧牛山,仲雍又名虞仲,山遂以虞为名。春秋时期的言偃生于常熟,北学中原,成为孔门七十二贤人中的“十哲之九”,晚年回归故土传道讲学,“道启东南”,“文开吴会”,死后葬于虞山东麓。仲雍和言偃,昭示了常熟文化源头的深邃和博大,标志着吴地早期文明曙光终于开启出一个区域文化的圣地。

常熟文化发展绵延不绝。南北朝昭明太子的“文选”,开始了常熟文化发展的自觉时代;自唐代陆器高中状元,常熟历史上出过8个状元483个进士;北宋时郑时性嗜书好藏书,开了明清时代常熟出版、藏书兴盛的先河,赵琦美与脉望馆、瞿氏与铁琴铜剑楼、毛晋与汲古阁都对中国文化史作出过重大贡献;元代的黄公望,以其绘画理论和创作开创了明清山水画的新纪元;明清之际以王翬为首的“虞山画派”、以钱谦益为代表的“虞山诗派”、严澂的琴学理论和虞山琴派,还有虞山书派、虞山印派等,都达到全国一流水平,影响一时风气;近代

以来,黄人的文学史论、曾朴的谴责小说等,表明常熟文化在求新变革时吐故纳新的活力。基于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常熟当代文明,更是显示了勃勃生机。

常熟高等专科学校就坐落在人文荟萃的虞山脚下,接受着常熟深厚博大的传统文化和生生不息的现代文明的滋养。学校在与地方经济和文化的互动发展中获得不竭的创造精神,塑造崭新的主体形象,确立自身的价值目标。学校有一批人文和理工学人,更是为常熟的传统文化甘泉所浸润,以虞山的人格精神塑造品行,用致远的人生追求敬业乐教。宋人朱熹在《丹阳公祠堂记》中说言偃为人,“必当敏于闻道而不滞于形器,岂所谓南方之学,得其精华者,乃自古而已然也耶”。明末龚立本纂修《常熟县志》15卷,其中《风俗志》说常熟士人“贫不负诺,富不易交,吐纳风流,意气横溢。人胜士,千里命驾者比比,人物显晦殊途,或矜名节,或树勋庸,或敦学术”,这都揭示了常熟传统文化中独特的人格精神。这种精神是常熟文化生生不息的产物和动力,也是常熟文化走向现代文明的底蕴和财富。常熟高等专科学校的学人,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大潮中,自觉地从立足的虞山福地的传统人格精神中汲取营养,坚持自强不息、敏捷好学、达美达诚的学风,在学术园地和育人园圃播种、耕耘和收获,形成了一批学术探索和教学研究成果,这是可喜可贺的。

常熟虞山,由于其深厚的文化积淀和不断的文化传承,已经成为一种文化创造的意象。正因为如此,我们愿意把这批初步的成果以“虞山文库”为名,汇集出版。我们无意创造学派,而意在宣示精神,表明当代学人对传承人文传统、创造现代文化使命的一种担当。我们衷心希望这项工作能够继续下去,能有更多的成果充实文库,承当起当代学人文化建设的重任。

2003年4月

## 目 录

- 导论：观念的联络与嬗变 ..... (1)
- 一、“诗体解放”论：奠定新诗发展的坚实起点  
——从“诗界革命”到“诗体解放” ..... (13)
- 二、“为诗而诗”论：开辟新诗发展的第二纪元  
——从非诗化到纯诗化 ..... (40)
- 三、“大众诗歌”论：实现新诗发展的方向转换  
——从纯粹诗歌到大众诗歌 ..... (68)
- 四、“综合传统”论：探索新诗发展的宽广道路  
——从诗学偏至到诗学融合 ..... (93)
- 五、“服务政治”论：构建新诗发展的政治模式  
——从多元探索到统一诗歌 ..... (121)
- 六、“个人写作”论：开启新诗发展的无名时代  
——从拨乱反正到走向边缘 ..... (149)
- 主要参考文献 ..... (178)

## 导论：观念的联络与嬗变

(一) 中国诗歌由古典型向现代型转变,其间有一个短暂的近代型的过渡期。就现代新诗发展说,酝酿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之交,诞生在 1917 年,成形在“五四”时期。这样算来,中国新诗的发展已经有了百年的历史。梳理新诗发展历史,揭示新诗发展规律,成为极富诱惑力的话题。事实上,伴随着新诗的发展,研究界就开始写作中国现代新诗史著作。早在 20 年代<sup>[1]</sup>,就有胡怀琛编的《〈尝试集〉批评与讨论》(1923)、闻野鹤的《白话诗研究》(1925)、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第四章“诗”》(1929)、张秀中的《中国新诗坛的昨日今日和明日》(1929)等,以后此类著作更多。研究者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形成了新诗和诗学发展的整体观念,推动着现代新诗与诗学的发展。但这其中大部分研究成果呈现着两个重要特点,一是同中国现代的政治斗争、政治思潮和意识形态联系紧密,把现代新诗发展史纳入中国革命发展史;二是同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联系紧密,把现代新诗发展史纳入现代文学发展史。毫无疑问,这两个“联系”是必然的,因为中国现代新诗发展本身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组成部分,就其基本趋向而言,两者的发展线索和面貌是一致的;而中国现代文学又是在中国现代革命和文化的背景中发生发展

[1] 本书涉及年代未注明者,皆指 20 世纪。

的,文学的现代化是与20世纪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全面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相适应,并且是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是,因为有必然联系就把现代新诗的发展简单地予以纳入,包括分期、话题、演进、面貌等都予以简单地比附套用,则也有不完善之处。因为作为现代文学的一个特殊品种的新诗发展,也有着自身独特的内部矛盾运动,其发展轨迹和基本面貌同时又是这种内部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

近期,在“文学史学观与文学史叙事”的研讨中,有人就提出了“从小叙事进入当代文学史”的意见〔1〕。传统的文学史研究追求“宏大叙事”,依赖于先进的历史观念和逻辑结构,从历史背景到具体作家作品和流派,从经济政治关联到意识形态,优点是全景效果和整体把握,缺点是趋向同一,难以显示独特性质。相反,“小叙事”则着眼于一些具体的、多样的和富有特色的修史路径,它不是不关心总体性,而是在总体性的语境中寻找别具一格的微观视野,去努力呈现特定的文学史。近年来这类新诗史著作正在多起来,如李新宇的《中国当代诗歌艺术演变史》,用“文学史应是文学艺术自身发展演变的历史”的观念,勾勒了当代诗歌艺术演变轨迹和运行规律。基于这种认识,我们想从“诗学史”路径叙述现代新诗史,提供一个关于现代新诗史的个性叙述和解释的文本。

(二)“诗学”从辞典意义说,一是“作诗、论诗的学问,二是研究诗歌创作规律的著作。两个义项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前者强调“过程”,后者强调“内涵”。我们使用“诗学”,则主要取后一义项,“中国现代诗学”指的是关于中国现代新诗创作和批评的诗学理论,既体现在诗学著作中,也体现在诗学专论和批评中,还体现在新诗创作中。它是内含在以上著作、专

〔1〕周宪:《从小叙事进入文学史》,《东南学术》2001年第1期。



论、批评和创作中的属于观念形态的或曰理论形态的东西。

按照我们对“中国现代诗学”的界定，中国现代新诗史上的诗学理论是极为丰富的，甚至可以说是芜杂多元的。一部新诗史是各种流派纷呈更迭的历史，而每一流派一般都有完整的诗学体系；现代新诗发展史上形成了一批卓然成家的诗学理论家，他们一般都有着各自独立的诗学体系；伴随着新诗创作的诗歌批评和评论，都强烈而鲜明地在表达自己的诗学观点，每一位进入新诗创作的诗人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表达自己的诗学观点。面对这样的诗学话语，如果要较为具体而完整地描述它，就需要写作庞大体系的诗学理论发展史和批评史。而我们想写的仅仅是“史略”。“史略”将对中国现代诗学作如下处理：第一，选择那些对于“史”具有重要价值的现代诗学来叙述，以形成“诗学演变史”；第二，对那些具有重要价值的现代诗学作概括性、勾勒性的叙述，以呈现诗学史的线索。据此，我们认为，中国现代诗学发展史上，有六个观念是至关重要的，这就是“诗体解放”论、“为诗而诗”论、“大众诗歌”论、“综合传统”论、“服务政治”论、“个人写作”论。以上六个观念就其本质来说，都对新诗的本质作出回答，由这种回答引出一系列诗学本体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各自构建自身的诗学体系。六个诗学观念的不断提出、发展和消亡，自然地造成了中国现代诗学的更迭嬗变，贯穿起来自然地形成了中国现代诗学理论的发展历史。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们把这六个诗学观念称为核心观念，以区别于一般的诗学观念。我们所要叙述的“史略”就是以这六个核心观念作为基本骨架，以相关的诗学理论作为血肉，清晰地勾勒出中国现代诗学理论的演变史。我们将会看到，这些诗学观念的嬗变更迭，引起了整个新诗发展面貌的演化，带来了整个新诗审美品格的改变，也构成了新诗流派发展和主流诗潮发展的历史，连

贯起来看则是其内部的矛盾运动,推动着中国现代新诗和诗学沿着面向现代、面向世界不断走向成熟的方向发展。

(三)由六大核心观念更迭形成的中国现代诗学史,大致可以划分出六个发展时期。第一时期是“诗体解放论:奠定新诗发展的坚实起点”。中国现代型新诗诞生在1917年,但它孕育在19世纪末的文学改良运动中,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诗界革命”就开始酝酿,直到胡适提出“诗体解放”论,尝试白话新诗,再到“五四”时期新诗创作终于成形并占据诗坛。“诗体解放”既是形式的又是内容的,它促使中国新诗冲破传统型越过近代型而走向现代型。第二时期是“为诗而诗论:开辟新诗发展的第二纪元”。“诗体解放”所体现的“白话一自由诗学”,以当时流行的新文学观念为理论基础,以破坏的力和势促使新诗同旧诗划清界限而进入草创期,存在着严重的“非诗化”倾向。“五四”后期,在“文学只有美丑之分,原无新旧之别”的新的文学观念影响下,就开始酝酿突破。其诗学理论指导就是“为诗而诗”论。由20世纪20年代前中期周作人的鼓吹和新月诗派的酝酿,到20年代中后期象征诗派正式打出纯诗学的旗帜,再到30年代“现代”新诗创作不再的黄金时代,掀起了新诗史上的纯诗运动,终于为新诗开辟了发展的第二个纪元。这里的“现代”是有特定的内涵,即同西方20世纪现代诗歌和诗学接轨。第三时期是“大众诗歌论:实现新诗发展的方向转换”。由于纯诗论的偏至,经过一段酝酿后在20世纪30年代初新诗与诗学发展出现了大众化趋向,并逐步成为诗坛的主流诗潮,它是新诗和诗学发展中的一次意义深刻、影响深远的方向转换。具体说就是诗歌从个人的抒情过渡到时代音响的有力愤呼,从新诗进入建设时期后基本走着纯诗化到面向现实的大众化趋向,从新诗基本局限在雅文学的范围扩大到俗文学的天地,从新诗的以知识

分子为主体发展到以广大人民群众为主体。这种转换在一定意义上形成了发展新诗的新的路线。新诗大众化大致经历了“左联”时期诗歌、抗战时期诗歌和解放区诗歌三个阶段。第四个时期是“综合传统论：探索新诗发展的宽广道路”。纯诗化和大众化都是偏至的发展，其正面和负面的影响都促使新诗人深入思考新诗和诗学发展问题，结果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一批诗人开始形成以“融合”为主要特色的诗学理论，开辟了新诗和诗学发展的多元格局。在这过程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形成互补的两个重要诗歌流派，就是以胡风为首的七月诗派和以穆旦为首的九叶诗派，他们的诗学理论和诗歌创作标志着中国新诗走向成熟。第五个时期是“服务政治论：构建新诗发展的政治模式”。随着“文学革命”向“革命文学”的发展，在20年代末开始强调诗歌服务政治，反映时代，大众诗歌则在战时背景下进一步加强了诗歌功利观，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开始构建诗歌的社会政治模式，这种模式终于支配了建国后近30年的新诗创作和诗学探索，“服务政治”论在建国17年中成为主流诗潮的理论基础，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到极端。在半整合和全整合的社会文化作用下，“服务政治”论扼杀了诗歌和诗学的多元探索，造成了诗的内容统一、流派贫乏和形式单调，形成诗史上的所谓“统一诗歌”阶段。第六个时期是“个人写作论：开启新诗发展的无名时代”。“文革”后的归来诗人群和朦胧诗人群，共同做着拨乱反正的工作，解构着“文革”语境和言说方式。新时期诗坛基本流向表现为先锋诗人经历了朦胧诗（80年代前期）、第三代诗（80年代后期）和后朦胧诗（90年代）三个阶段，最终在中国社会的重大转型的80~90年代之交正式形成“个人写作”论，明确地提出结束群众写作、政治写作和纯诗写作，并使中国现代诗歌和诗学进入到一个边缘写作的无名

时代。“无论这种无名状态初看上去显得有多么陌生，抑或令人感到非常不适，但它毕竟使文学摆脱了时代共名的制约，在社会文化空间中发出了独立的声音。”〔1〕

这就是从诗学史略叙述中我们所获得的发展分期结论。它与传统分期有相当大的不同：首先在于突破了按中国革命历史发展阶段来划分新诗发展阶段，又突破了按现代文学发展阶段来划分新诗发展阶段。其次更重要的是这种分期中各期在时间上并不像传统的那样一刀两断，而是往往呈现着交叉复合。这其实倒是容易理解的，因为我们需要揭示的是诗学演进的历史。事实上每一诗学理论的酝酿、产生、发展和隐退都是一个连续的进展过程，只是当其在诗坛占据主导地位时才确定其命名时期，因此其酝酿和退隐阶段与其他时期重合就十分正常，即使两种诗学理论在同一个历史阶段对立互补，也完全是正常的，它并不影响我们从诗学叙事去完整地勾勒现代新诗发展的历史。

（四）人们习惯于把某种新的诗学理论占据诗坛称为“崛起”或“异军突起”，这是因为新的诗学观念总是富有创新意识，是对现存的诗学观念的突破。它的出现标志着一种新的诗学观念、诗艺结构和审美尺度的确立，相对于以前的诗学理论是一种整体更新或对峙，它决定着整个诗学史的演变和进步。而且，新的诗学理论的确立，往往是在对旧有诗学理论的批判中进行的，并且往往以主观偏激的形态出现。对此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对于富有创造精神的诗学理论家，偏激既是不可避免的，也是绝对需要的。不偏激就无法从旧的思维和束缚中解放出来，也不能提出新见以振聋发聩的影响推动

〔1〕 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38页。



人们形成新的共识。因此,就中国现代诗学发展来说,新的诗学理论的提出和确立,是一种富有创造的诗学革命。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又可以说,一部现代诗学发展史,就是富有创新精神的诗学革命的历史。

作为“崛起”或“突起”的诗学理论,都不是空穴来风,都有风起于青萍之末的过程,都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必然结果。我们可以把推动诗学理论的确立的诸因素分成两个方面:一是需求条件,二是创造条件。就“需求条件”来说,主要是现实的社会的需求和诗歌发展的需求。事实上,“诗体解放”论就是顺应着自由地表达新思想、新文化的社会和时代的要求提出来的,又是在诗歌近代化的过程中呈现的白话化和散文化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离开了这些外部的需求和内部的需求,某种诗学观念的提出是不可思议的。因此作为小叙事的诗学史不应淡化历史意识。小叙事带有局部知识的特征,不是一种追求全面、完整的宏大叙述,而是从某个特定的视角出发,来审视一段历史及其问题,但还是需要强化历史意识,凸显历史的脉络和逻辑。就“创造条件”来说,首先就是向域外诗学借鉴。中国现代诗学发展的重要特征,就是在其初创阶段就形成的开放品格。朱自清认为民六的新诗运动在观念上就接受了外国诗的影响。他认为新诗模仿外国诗,“这并不就是奴隶根性;他们进步得快,而我们一向是落后的,要上前去,只有先从效法他们入手”。新诗“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外国的影响;别的原因都只在这一个影响之下发生作用。外国的影响使我们文学向一条新路发展,诗也不能够是例外。”〔1〕如初期白话诗运动与西方意象诗论,“五四”浪漫

〔1〕朱自清:《新诗杂话·真诗》,《朱自清全集》(2),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386页。

诗运动与西方个性主义,新月诗派与巴那斯主义,象征诗派与西方纯诗理论,现代诗派与西方象征主义,九叶诗派与英美当代诗学等等,其间的联系是十分清楚的。但是在借鉴的基础上,还需要继承中国传统诗歌理论,继承新诗发展传统,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和观念更新。在这方面中国现代诗学建设中既有经验也有教训,某些诗学核心概念的酝酿、形成和发展就是如何把对外借鉴和纵向继承更好地融合的过程,如“为诗而诗”论的发展就是逐步地由外来诗学的横移到与中国传统纯粹的诗学观念的创造融合的过程,这一过程也就使现代诗学在发展中呈现着矛盾运动的独特性、丰富性及进步性。周作人在为刘半农《扬鞭集》写的序中讲到新诗的发达,明确指明“新诗本来也是从模仿来的,它的进化是在于模仿与独创之消长”。事实上,每一诗学理论的确立,都不纯粹是借鉴横移,也不纯粹是纵向继承,而是包含着传统的继承和理论的创造。根据这样的认识,我们在思考和勾勒中国现代诗学发展史略时,就自觉地注意到揭示出每个核心诗学观念产生的“需求条件”和“创造条件”,注意到分析出每个核心观念在自身发展中各种条件因素矛盾运动的演化历史。

(五) 六个诗学核心观念的更迭演化,成为中国现代诗学自然发展的历史,既有前后相继,又有交叉互动,成为生动的有机的整体。在这发展过程中始终交织着两个基调,就是新诗的善和新诗的美的双重变奏,呈现的面貌或是偏至,或是融合,或是消解。这种基于观念内在的矛盾运动,既同这一时代的外部社会环境对诗学的社会责任要求有关,也同这一时期的诗歌自身发展对诗学的建设责任要求有关,诗学工作者始终面临着两种压力和两种选择,一是来自社会外部,一是来自诗歌本身。20世纪中国现代诗学建设就是在这种“苦恼”的选择中进行,而这种选择的独特性就构成了中国现代诗学建

设的独特性,中国现代诗学理论的许多问题都可以从这一特性中得到解释。

新诗诞生的“五四”时期,是开放的、自由的、富有创新活力的时代。在“诗体解放”论的推动下,新诗诞生和成形,主要是由认为诗是“说”出来的初期白话诗派和诗是“写”出来的“五四”浪漫诗派来完成的。茅盾在《论初期白话诗》中指出:“初期白话诗的最一贯而坚定的方向是写实主义。”其现实主义精神,“题材上是社会现象和人生问题的大量抒写,方法上所谓‘须用具体的做法,不可用抽象的说法’”〔1〕。而“五四”浪漫诗派的诗学则是“自我表现”的艺术本质观、“自我创造”的艺术生成观、“自主自律”的艺术功能观,以及自由开放的艺术形式观。由于具体的诗学理论的差别,初步形成了唯美与唯善的分野,在“五四”时期就开始出现了关于“人生的艺术”与“艺术的艺术”,或曰“血和泪的文学”与“美和爱的文学”,或曰“诗是贵族的”与“诗是平民的”的争论。到“五四”退潮新诗中落之后,人们在新诗的危机面前经过反思,主张从“五四”的“白话—自由”的诗学观念中解放出来,展开了关于“诗的效用”的讨论。从这场讨论开始,中国现代新诗和诗学发生了分化(或曰分歧),或沿着功利主义方向而走向唯善的偏执,或追求美的鹄的而趋向唯美的偏至。“为诗而诗”和“大众诗歌”就是这种分化的具体表现和极端发展。“综合传统”论试图实行两者的综合并且也在追求综合方面取得重要实绩,但诗坛的主流还是“唯善”的发展即大众化的潮流,并在建国后由解放区文学精神扩展影响到全国,终于形成了“服务政治”的一统天下,并且一直影响到70年代

〔1〕 茅盾:《论初期白话诗》,《中国现代诗论》(上),花城出版社1985年版,第310页。

末的中国现代诗坛。70年代末随着思想解放和拨乱反正运动的开展,中国现代诗歌和诗学基本面孔是对“五四”传统的呼唤,最直接的承续则是“综合传统”论的诗学观念,但并没有形成在诗学发展史上具有自身独特价值的核心诗学观念,因此注定成为一种“过渡形态”。但它仍有着不可忽视的诗学发展史意义,就是它又一次冲破唯美的偏至和唯善的偏执,开始寻求一种新的综合传统,从而预言着诗学发展新时代的到来。到80年代中期后,诗坛的发展就呈现多元化,在其中对中国现代诗学发展起导引作用的是“个人写作”论。“个人写作”坚持的是所谓独立的自由的沉潜的知识分子立场和文化姿态,明确地提出结束中国现代诗歌和诗学史上存在的群众写作和纯诗写作(实质是唯善写作和唯美写作)等偏至,把写作建立在一种更为独立的“个人”基石上,自觉维护诗歌多样性和多元化局面。由此可见,“个人写作”是对以往的诗学观念的整合和超越,它突破了唯善和唯美的争论,而从诗人、诗学、诗歌的基本品格上为中国新诗的发展指明了新的道路。当我们作以上梳理后,就会清楚地得出结论:中国现代诗学理论尤其是核心诗学的演化是有规律可寻的,是具有生长性的有机体,其发展呈现着自身的独特性和历史的进步性。

中国现代新诗和诗学发展的历史,是不断趋向现代化的历史。新诗和诗学的现代化,是由时间观念的现代性和审美品格的现代性两个方面的趋向构成的。中国新诗按照时间现代性的要求,提出了“新诗”的概念,并通过诗体的大解放诞生了一批新诗。最初的新诗和诗学在于同旧诗划清界限,在于显示时代的进步,初期白话新诗和浪漫诗歌都反映了“五四”时代精神。《女神》诞生后,闻一多认为它配称“新诗”,是因为“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最远,最要紧的是



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二十世纪底时代精神”〔1〕。这种评价最清楚地表明了时间观念的现代性标准。以后，新诗和诗学的探索始终注重反映“现时代”，即使反对把诗作为时代号角的现代主义诗人，也强调诗的“现代性”。在审美品格的现代性方面，现代诗学探索主要是在四个层面展开：一是语言符号层面，语言符号系统为适应现代社会生活和现代人的表达要求而发生变化；二是诗艺技巧层面，创作的思维方式为适应现代生活和现代思维要求而发生变化；三是诗学理论层面，主要表现在文学审美本体观念的自觉化和文学功能价值观念的多样化；四是情思生活层面，诗歌内质趋向于现代人的主体自主性要求，传达出现代生活意念和现代情绪色彩。中国现代诗学和诗歌正是在时间和审美两方面趋向现代化。

（六）在叙述中国现代诗学史略时，对各种诗学理论的价值判断，都不能使用简单的肯定与否定的处理方法，而必须把它作为特定的历史范畴，客观地展示其发展演化过程和规律，指明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局限性。这应该成为我们叙述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对中国现代诗学的价值评价，目前最有分歧的就是对于“大众诗歌”的提出以及由此逐步形成的诗学社会政治模式的评价，以及对于“为诗而诗”的提出而开始引进现代主义唯美诗学的评价。从总体上看，对于前者，我们首先肯定“大众诗歌”论提出是现代诗学具有积极意义的方向转换，它使新诗诞生以来就交织着的矛盾如引进西方诗艺和发扬中国传统、雅和俗、面向现实和提高诗艺等可以更好地展开，有利于新诗走更加健康、健全的发展道路；其次又要把“大众诗歌”

〔1〕 闻一多：《〈女神〉之时代精神》，《闻一多论新诗》，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